

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

吕超

【摘要】本文梳理宫崎市定著述活动早期提出的“素朴民族”和“文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思路,用实证的方法证明该学说渊源自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论著,并将此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阐明该学说在学术外衣下隐藏着合理化侵略战争的思想实质。

【关键词】宫崎市定;二元文明论;伊本·赫勒敦

【作者简介】吕超,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原文出处】《国际汉学》(京),2021.1.37~43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宫崎市定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批准号:19DWWJ03)的阶段性成果。

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 1901-1995)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西亚史、东西交通史和亚洲史,著作等身。特别是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史构想,并在此宏大视野下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然而,宫崎市定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有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1940年宫崎市定在其首部专著《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①中采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即宫崎市定所说“素朴民族”)和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文明社会”)相互对立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二元对立论”大致可表述为:汉民族文化较周边民族文化先进(文明化),周边民族具有与汉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素朴性),此为周边民族的一大优势;随着文明化的加深汉民族会出现“文明中毒现象”,周边民族受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吸引以武力征服汉民族,此过程可为汉民族注入“活力”,使之“解毒”获得“新生”;周边民族在汉民族的影响下“文明化”后会失去素朴性,自身被消解;调和文明和素朴的关键是“科学”。

从宫崎市定“二元对立论”的逻辑中不难看出该

论具有合理化战争的目的,国内对此早已有过激烈批判^②,宫崎市定自己亦坦然承认该论的“时局性”。本文拟爬梳宫崎市定“二元对立论”思想的学术渊源、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实质进行考察。

一、“二元对立论”的结构分析

宫崎市定用“文明—素朴”二元对立的框架分析中国历史之前,先将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发展描述为二元对立。有关对立的二元文明的关系和特征,宫崎市定认为“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周围的野蛮民族,同化着周围的野蛮民族”,但是在野蛮民族受文明社会刺激并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中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失去的往往是本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宫崎市定称“这种最为宝贵的东西叫做‘素朴性’”^③。在宫崎市定的论述当中,汉民族和周边民族处于同等地位并共同构成了“东洋”^④,中国是东洋的文明中心,周边“分布着许多未开化的民族,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将他们视作夷狄戎蛮并加以蔑视”,但是宫崎市定强调这些“未开化的民族”却有着“被文明人早已忘却了的一大优点”。他称:

文明人有文明主义的教养,素朴人有素朴主义的训练;文明人善于思考,素朴人敏于行动;文明人是理智的,素朴人是意气的;文明人情绪缠绵,素朴人直截了当;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阴柔,素朴人具有男性的刚强。更进一步说,文明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素朴人囿于集体统制主义,总之,在几乎所有的方面,两者之间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特征。^⑤

宫崎市定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和论述,即在此预设的“文明—素朴”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展开。换言之,中国历史被宫崎市定置于这个框架中考察,抑或可说他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去逆推预设的结论。与素朴民族所具有的种种特性相反,文明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宫崎市定将汉民族建立的文明社会所呈现出的特性称为“中毒”现象。概而言之,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1.沉溺于文明和享受,学问“游戏化”“竞技化”;2.文明人身体逐渐弱化;3.文明社会的人心逐渐复杂化;4.文明社会比素朴民族更加迷信;5.文明社会是个人主义。率先文明化的地区的文化会流向周边的未开化民族并刺激他们觉醒,例如春秋时期的历史便是“以周围中心的中原文明向周围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传播并使其觉醒的时代”^⑥。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传播而来的“文化”态度有迎有拒有沉溺,只有积极摄取者方得以存续并壮大,“新兴民族的势力一旦进发,恰如堤坝无法阻挡奔流,任何人都难以阻止”,即周边民族在摄取汉民族文化后势力不断壮大,同时保留着素朴性,反而从“周边”入主“中心”,但不久会被同化,出现“文明中毒”进而腐化的现象。宫崎市定在此特别强调“这种现象不仅见于春秋时期,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反复出现”^⑦。

宫崎市定依据这种逻辑,将中国王朝兴替之因都归结于此。商周之替、汉之代秦、蒙元之兴、宋元更迭和明清易代等都用此框架来分析和论述。举例而言,宫崎市定认为战国时期的秦朝人“极具素朴纯真的一面,有着战士最应具备的素质”,而其时的“魏国是中原文明最为烂熟”,“六国平定之后,中原文明

急速影响到了秦地,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层很快就中了文明之毒”,所以,秦朝灭亡除了“实力不足”外,主要原因便是“内部的腐化”^⑧。再如关于隋王朝短命而亡的原因,宫崎市定亦将之归于“隋炀帝嫌弃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中地区的干燥无味,重蹈亡陈的覆辙,憧憬浮华的文明生活……沉湎于安逸奢华的生活”^⑨。另一方面,周边民族在汉民族文化刺激下逐渐壮大、勃兴,加之他们孔武有力,屡屡入主中原,这种现象在宫崎市定的解读中是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活力”,让腐朽堕落的文明走向重生的过程。比如,宫崎市定素承内藤湖南(Naitō Konan, 1866–1934)“唐宋变革说”,对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唐代的评价亦被宫崎市定置于“二元对立论”的脉络下,他认为“汉末以来,已经高度文明化并因此而堕落的中原社会,因被游牧民族的侵入而脱胎换骨,到了唐代,迎来了面目一新的新社会。唐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程度令世人瞩目,这其实是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奠定下来的历史发展轨迹”^⑩。从宫崎市定此论的结构和逻辑演进已不难看出其学术研究背后的政论色彩。最值得注意的是宫崎市定对满族建立清朝这段历史的论述,此部分被冠之以《以素朴主义为理念建立的满洲帝国》的标题,有关于此,留待文章第三部分进行详细考察。

二、“二元对立论”的形成过程与学术渊源

宫崎市定很早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交涉之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其高中时代。1922年,宫崎市定毕业于松本高中并被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录取。入学前,宫崎市定的笔记当中有《赴京都后的工作》一文,其中即有“塞外民族与汉民族”一项内容^⑪,可知此时的宫崎市定已对“北方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涉史”^⑫这样的民族关系史抱有兴趣。此外,据宫崎市定回忆,其入京都大学学习之际“正值敦煌学、西域学、塞外学的全盛之时,鲜有未受其风影响者”^⑬。毕业后的宫崎市定进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桑原隲藏(Kawahara Jitsuo-

zo, 1871-1931)继续攻读东洋史。桑原隲藏毕业于东京大学,乃治东西交通史之名家,其学术旨趣和治学方法对宫崎市定均颇具影响。

1927年,宫崎市定任教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在此期间,他主张应该将中国的唐朝和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进行比较,当时的授课笔记中记载:

罗马帝国崩溃后各新民族勃兴并纷纷建立国家,由此形成今日欧洲之列国体制。东洋亦是如此,唐朝灭亡版图分崩离析之后,拥有清新活力的野蛮民族由此勃兴并建立国家,今日所见东洋各民族的分布之基础亦由此形成。^⑭

从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其时宫崎市定“周边民族—汉民族”对立的构想已经初见端倪,而这种“端倪”在内涵和细节方面得以进一步地深化和体系化则是在1939年前后。1939年,史学会50周年纪念大会在东京举行,宫崎市定在该会上作了一场题为《羨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的演讲,该演讲的要旨载于1939年7月发行的《史林》杂志上。全文如下:

该论以《羨不足论》为题,从盐铁论中的“散不足”“聚不足”“前不足”说起,讨论了中国史上奢侈的变迁,进而论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说来,分三个时期来讨论奢侈的性质的变迁。首先是自殷纣王到汉代这一时期,以量大为奢侈;自六朝始关注奢侈的内在质量,但在手段上仍存颇多不合理之处;又至唐宋之际,奢侈则更为合理化,尤其分工形成、科学精神日盛,奢侈由此变得甚为考究。^⑮

由如上引文可看出,宫崎市定的“二元对立论”此时虽可谓大框架已备,但并未完全成熟,仅从时间上来看,更是只论述到宋代则止。以该演讲的内容为基础,宫崎市定发表题为《羨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的论文,该文仅在演讲题目上添加了副标题,整体的论述思路与演讲的内容一致。宫崎市定该论体系化的全貌最初得见则是在《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中。

宫崎市定该思想走向成熟、体系化的契机是宫崎市定与伊本·赫勒敦(Abū Khaldūn, 1332-1406)所

著的《历史序说》^⑯一书的邂逅。伊本·赫勒敦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历史序说》问世之后影响巨大,1863年便被法国学者全文译介到法国。该书第二章题为《农村与沙漠的文明野蛮民族、各部族以及他们所呈现的各种状态贯穿其中的定理和说明》^⑰,此章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二元对立的框架考察人类社会,分为29个条目详细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正如伊本·赫勒敦巨著的中译本译者李振中教授所言,伊本·赫勒敦认为历史发展是周而复始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经历了发展、壮大、衰败和灭亡的阶段后,另一个国家在前一个国家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重复同样的阶段,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⑱。受篇幅所限,以下仅对伊本·赫勒敦之学说做一简单介绍,以窥宫崎市定之说与伊本·赫勒敦论说之渊源。例如,伊本·赫勒敦认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发展要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建者对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艰难的创业过程记忆犹新,所以保持简朴的生活,受到人们尊重;第二阶段,权力加强了,各种物质条件具备了,开始从简朴的生活转向享受;第三阶段,完全忘记了过去的艰苦,也失去了艰苦创业的荣誉感,完全沉湎于物质享受之中,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威信,政权濒临灭亡。^⑲

不仅如此,伊本·赫勒敦还将人类社会分为城市生活、平原和山区的农民生活和游牧生活三种。他认为游牧生活的人们“生活艰难,但思想自由”,比如“阿拉伯人、蒙古人生活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沙漠地区,培养了他们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和不怕牺牲的性格。一旦机会成熟,他们就冲向生活安逸、满足于现状的文明地区的居民,席卷各个城邦和国家”。以此为据,伊本·赫勒敦“主张人类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他还称“那些生活艰苦的沙漠民族,他们的身体要比生活安逸的城市居民强壮,他们的肤色更健康,道德更高尚,体形更俊美,思想更纯正、更敏锐……”^⑳。稍作比较即可发现,宫崎市定的论述与伊本·赫勒敦

此著的内容共通之处颇多,可以说宫崎市定此论的整体框架和逻辑路径均受伊本·赫勒敦的影响。

1936年宫崎市定作为驻外研究员被派遣赴海外留学,开始了其两年的留法经历。在此期间,宫崎市定流连于书店,注重搜集中国、西亚相关的书籍^④。除此之外,还不得不提及对宫崎市定学术和思想形成影响巨大的西亚旅行。1937年9月,宫崎市定作为日本代表出席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大会,“草草参加完人类学会后,我便直奔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了十几天,……进入叙利亚,……又前进至伊拉克,探访了摩苏尔和巴格达。……经由巴勒斯坦进入埃及,在探访了中埃及的古迹后横渡地中海,经由希腊和意大利返回了巴黎”^⑤。宫崎市定游历了西亚各国后,感慨于“产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与宋代以后的中国是何等地相似,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令人震惊的先进性及其现今的停滞性”^⑥。此次游历对宫崎市定史学论述的宏大世界史构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⑦以此次游历西亚的游记为基础,宫崎市定增补了一些内容后,以《菩萨蛮记》(1944)为书名出版。宫崎市定与伊本·赫勒敦著作的邂逅即在法国或此次西亚游历期间。此事可从其同事田村实造(Tamura Jitsuzo)处得以确认。1959年,受亚洲经济研究所委托,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以田村实造为代表负责研究伊本·赫勒敦的经济思想。作为该项目的成果,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序说》被译为日语并于1963年出版。田村实造在该书的《序言》中称:

接受此项事业之际,承蒙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ō, 1904–1980)、青山秀夫(Aoyama Hideo, 1910–1992)教授诸同道之多方关照。另,宫崎市定教授将其秘藏之E.M.Quatremère校订本长期地慷慨借予,还承蒙众教内清教授多方指教有关伊斯兰的天文学、占星术方面的知识。^⑧

文中提及的“E. M. Quatremère校订本”即是由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E. M. Quatremère, 1782–1875)校勘的版本,该书出版于1858年,是“质量极好而近于完

美的版本”^⑨。据田村实造所言可知,宫崎市定甚为珍视该书。宫崎市定1938年自法归国后直至1960年才再次有机会身赴海外从事学术活动。此外,宫崎市定在其1948年出版的著作《亚洲史概说》(续编)^⑩中亦曾直接提及伊本·赫勒敦及其巨著《历史序说》,他对伊本·赫勒敦大加赞赏,称“最当注意的是,生于突尼斯而于15世纪初歿于开罗的伊本·赫勒敦,其不仅有卓越的历史著作传世,更因其著作之卷首所附‘绪言’被称为世界上的历史哲学的鼻祖”^⑪。结合前述内容来看,此书极可能系宫崎市定在留法期间购得并带回日本。也正是在留法期间,宫崎市定在东洋语言学校学习阿拉伯语,虽其自言“无功而废”,“但回国后还是召集了想学阿拉伯语的同好者,自己像一台录音机似的,把在巴黎学到的那一部分内容播送给了他们”,宫崎市定甚至称“今天我们研究室的阿拉伯问题研究者辈出,每念及此,我心中不免暗自骄傲”^⑫。此处亦可看出宫崎市定对西亚问题研究的关心和兴趣异常强烈。京都大学学生中,藤本胜次(Fujimoto Katsuji, 1921–2000)最早使用阿拉伯语史料做学术研究,他的阿拉伯语启蒙老师便是宫崎市定。据他回忆,宫崎市定的阿拉伯语水平虽未达到自如地处理阿拉伯语史料的程度,但用阿语阅读却是可以的^⑬。

宫崎市定“二元对立论”框架的思想来源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上述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但却不是唯一来源。宫崎市定的该论与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的“南北对立史观”和内藤湖南等人的论说有颇多共通之处,宫崎市定此论亦渊源于此。受篇幅所限,在此暂不论及。

三、“学术外表”下的“政治内里”

抗战期间,日本的中国研究往往与战争的需要契合,在行文中甚至直接露骨地合理化战争来为战争服务。旗田巍(Hatada Takashi, 1908–1994)曾指出“自明治初年至战败,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大致以朝鲜→满蒙→中国→东南亚的路线推进,亚洲研究亦大体沿此路线发展而来的”,特别是“日本与中国之间

爆发了全面战争后,有关中国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可谓不可胜数”^④。

1940年,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羽田亨主持出版“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即是在战争带来的“中国研究热潮”下的产物。此时,抗日战争正日趋激烈,日本国内亦因此格外关心战争动向,自然异常关注中国。在羽田亨为这套丛书撰写的《序言》当中,我们不难窥知当时之情状。

因此事变,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大任突加之于国民之上。当此之时,痛感有关东亚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各方面之知识尚十分欠缺,现争相埋首探究亦见相关著述大为盛行,虽不免有稍迟之嫌,但亦可谓一大可喜现象。^⑤

从羽田亨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对中国的“研究”非常之多,但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些研究出发点往往就含有美化战争的意图。所谓“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大任突加之于国民之上”云云,不过是合理化战争的一套常用说辞,并不能掩盖日本侵略亚洲的事实。另外,羽田亨所谓“痛感有关东亚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各方面之知识尚十分欠缺”,正能体现这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研究实际是为侵略和殖民行为服务的。1938年9月,由企划院直接管辖的内阁直属的“国策咨询机构”东亚研究所成立,近卫文磨(Konoe Fumimaro, 1891-1945)出任总裁。同年1月、11月、12月,日本当局抱着分化国民党政权等目的,近卫内阁发表三次“声明”,^⑥尤其第三次声明中露骨地提出: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⑦

稍微回溯当时之历史便知,羽田亨的这番言论是积极配合日本当局的侵略行为而发的,丛书中的著作也不乏为建构合理化战争的理论,为侵略战争

寻找历史依据而故意歪曲历史的内容。

上述提及宫崎市定的著作正是作为“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的第四册出版的,其中亦不乏露骨地为侵略行为寻找历史依据的言论。例如,宫崎市定将清王朝取代明朝的历史称为“以素朴主义为理念建立的满洲帝国”,满族建立清王朝之初是素朴性的民族。而这种素朴的特性甚至有日本人见证,这里宫崎市定引入一个故事:1644年,几名日本人乘船过程中被风暴吹至“满洲”,这几人后被送回日本,他们在接受幕府询问时对清王朝大加赞赏,却贬损明朝遗民“北京人之心与满洲人不同,有盗贼,有虚言,似无慈悲”,他们甚至称“满洲吏人与我等手势交谈,称传闻日本人义理坚强,精于武士之道,且有慈悲之心,与我满洲甚似,并招待我等饮食”。宫崎市定在讲完这个真伪难辨的故事后评论道:

日本与满洲,在素朴主义的锻炼方面一脉相通,虽然语言不通,但以心传心即可交流,真可谓好汉知英雄。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明朝人无法治理的文明社会,在注入了数万满洲人这个新要素后得以安稳了下来,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蒙古人再也不南侵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不仅如此,清朝的威令西越葱岭,南及缅甸的崇山峻岭。医治文明病,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注入素朴主义。^⑧

照此逻辑,宫崎市定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了,即清王朝亦与之前的周边民族一样,无法逃出从“素朴”走向“文明”进而走向灭亡的“历史周期律”,如此,代替清王朝的是谁呢?宫崎市定此书就论述到此便已接近尾声,而全书最后一部分“东洋史上的新局面”最值得注意,宫崎市定的意图在此处便非常露骨地展现出来了。此部分的论述从“素朴主义与科学精神”“如何看待西力东渐”和“日本尚存素朴主义”三方面展开,单从标题亦不难窥知宫崎市定的思想实质。宫崎市定在这部分着力论述“欧洲在文明主义的表面下深藏着素朴主义”,并且欧洲社会“一直是以科学为轴心发展而来的”,欧洲科学技术不断进

步,“自然科学以外,文化科学作为一门新科学的出现也就有了可能”,虽然欧洲“有时也出现过迟暮衰落的迹象,然而切中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科学有会不断地引导社会的前进方向,将社会从堕落的危机中拯救出来”^⑧。由此,宫崎市定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科学才是联接文明生活与素朴主义共同协调发展的纽带”,^⑨毫无疑问,日本掌握了这个关键的“纽带”。宫崎市定接下来继续论证“东方世界还有一个素朴主义社会的存在,这就是日本”,单纯夸耀文明的古老并无用处,“所幸的是日本一方面有着古老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舍弃素朴主义的精神,这才是日本值得向世界夸耀的事实”,日本精神的可贵之处并不在文学等方面,“而是讷于言敏于行的素朴主义精神,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不过是与本质相距甚远的存在”^⑩。正是因为日本有着这样的素朴精神,日本才对“西方的科学文明有着惊人的判断力”。宫崎市定进一步称“日本与清朝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以后这两个国家的命运”^⑪。不仅如此,宫崎市定又称日本与“满洲人、蒙古人不同”,日本“具有发展性”,即“我国的国民成功地将科学移植到了日本,以至于最终掌握了如何使文明生活和素朴主义相互协调的关键”^⑫。

论及此处,宫崎市定的意图格外地清晰了,即保持了“素朴性”的日本要为“文明中毒”的中国注入“素朴”的元素来“解毒”,而且因为日本已经掌握了“科学”这个调和“文明”和“素朴”的关键,所以日本可以避免重蹈中国历史上周边民族的“覆辙”,这种论调无疑是在用历史书写合理化侵略战争,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张目。

结语

本文对宫崎市定的“二元对立论”进行了考察。首先分析了“二元对立论”的构造,并在此基础上爬梳宫崎市定此思想形成之过程和思想来源,发现宫崎市定较早时期便非常关注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但该论之论述框架和逻辑路径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宫崎市定深受伊斯兰中世纪历史学家伊

本·赫勒敦的影响。宫崎市定此论的确存在学术性的面向,但亦不可忽视其思想的实质。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宫崎市定的论述表面上是用“文明—素朴”这种“二元对立论”的框架来观察中国史,实际上更是一个逆推的过程,即他的立论过程似可看作是受伊本·赫勒敦等人的启发,预设一个结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和框架,然后通过这种框架分析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来证明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可谓之“结论先行”。宫崎市定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寻找“历史依据”,更在论述逻辑上合理化日本的侵略行为,其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外表下包含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宫崎市定此论包含的合理化战争和分裂中国的目的应当加以警惕和批判。在批判的同时,我们或许也要注意宫崎市定的论述亦有其学术性的一个面向。宫崎市定将伊本·赫勒敦的学说应用到中国历史上,以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此消彼长的框架来观察中国历史,而他认为一个民族是“此消”还是“彼长”取决于这个民族对“文化”和“科学”的态度。另外,宫崎市定注意到少数民族具备的一些显著优势和特点,并主张要保存这些“素朴性”,同时他批判过度文明化,反对沉溺于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过度文明化后,人们的身体弱化、女性化、思维复杂化,行为个人主义化,所以他主张要调和“社会性”和“素朴性”,这些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仍不失借鉴意义。

注释:

① 1940年,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Haneda Tōru, 1882-1955)负责策划出版“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宫崎市定所著《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为该丛书的第四册。之后该书被收录于《亚洲史论考(上)》《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东洋史》中。

② 比如在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前言》(上卷)中,即有大段文字对宫崎市定的论说进行相当激烈的批判。同时应该注意,该选集出版于1963

年,其《前言》中批判宫崎市定的言论难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集·前言》(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③宫崎市定著,张学锋、马云超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④宫崎市定所谓“东洋史”不外是中国史,无非是将中国描述为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史,在东洋史学的框架下,汉民族成“中国”,被东洋这个更大的地理范围涵盖,从而使之相对化。这种传统始自那珂通世(Naka Yose, 1851-1908)。同时,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的“王朝兴替史”的研究传统亦有一大转向,即追随西方史学潮流用“民族—国家”范式来研究中国史,这种研究方法的背后暗含将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分裂为若干个“国家”的意图。与此相关的论述颇多,可参看窪寺紘一(Kubodera Kōichi):《东洋史事始——那珂通世及其时代》,东京:平凡社,2009年。

⑤《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26-27页。

⑥同上,第39页。

⑦同上。

⑧同上,第48页。

⑨同上,第90-91页。

⑩《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91-92页。

⑪砺波护(Tonami Mamori)、藤井让治(Fuji Jyji)编:《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233页。

⑫《先学座谈——宫崎市定博士》,《东方学》2000年第100期,第318页。

⑬宫崎市定:《羽田博士与西域史》,《东洋史研究》1955年第14卷第3号,第1-4页,收于《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21页。

⑭宫崎市定:《亚洲史研究·序言》(第3卷),京都:同朋社,1963年,第4-5页。

⑮宫崎市定:《羨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史林》1939年第50卷第7号,第109-110页。

⑯该书日文版本为《历史序说》,内容是伊本·赫勒敦巨著《历史》一书的序论、第一部、第二部,该书共3卷,于1987年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中译本译者为李振中,题名为《历史绪论》,201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⑰伊本·赫勒敦著,森本公诚(Moritomo Kōsei)译:《历史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1457页。

⑱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译:《历史绪论》,银川:宁夏人

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⑲同上,第17页。

⑳同上,第18页。

㉑《京大东洋学百年》,第246页。

㉒《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271页。

㉓同上。

㉔对此笔者已经在《宫崎市定东洋史观的形成——青壮年期的经历及其影响》(《国际汉学》2017年第1期,第82-88页)一文中进行了探讨。

㉕田村实造:《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序说·序言〉》(上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

㉖伊本·赫勒敦著,森本公诚译:《历史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1452页。

㉗初版由人文书林出版,书名为《亚洲史概说》,分正编(1947)和续编(1948)。后由学生社于1973年再版,1987年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文库本。

㉘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续编),东京:人文书林,1948年,第261页。

㉙《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14页。

㉚此回忆见藤本胜次为《宫崎市定全集》撰写的月报,题为《古老的〈可兰经〉抄本》,《宫崎市定》月报14,2000年,第4页。

㉛旗田巍:《日本东洋史学之传统》,《历史学研究》1962年第11卷第270号,第33页。

㉜宫崎市定:《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东京:富山房,1940年,序言。

㉝有关于此,国内论及者甚众,如杨栋梁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中即有详细论述,见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㉞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4页。

㉟《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124页。

㊱同上,第125页。

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第125-126页。

㊳同上,第126页。

㊴同上,第127页。

㊵同上。